山东曲阜谋建中国首个“文化特区”,意在打造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圣地。“文化特区”向无先例,建不建?怎么建?期待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曲阜“文化特区”,“特”在何处?

■曾振宇

曲阜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被国人远远低估!

去年在北京东长安街耸立的孔子像,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2010年底,一篇有关曲阜市要建基督教三一教堂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是什么原因使曲阜一次次成为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的焦点?甚至已经成为了“曲阜文化现象”?这是因为曲阜在中国文化上至高无上的特殊性、重要性和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造成的。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其长期在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值得珍惜的民族精神家园,譬如雅典、耶路撒冷、麦加等等。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既是伟大文明的系统化符号象征,又是该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任何一个伟大文明的精神家园都是值得敬畏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雅典奥林匹亚山举行,虽然圣女背后只有几处残垣断壁,但它是文化的象征,因此无比神圣与崇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尽管已经占领了法国巴黎,但他们不敢毁坏罗浮宫一砖一瓦;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宗教之间相互大屠杀,血流成河,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神圣的文化建筑象征物仍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从不敢破坏信仰的象征——清真寺。与此相反,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一旦遭到破坏,其引发的民族情绪如海啸地裂,甚至历史为此改写。1898年春季,德国人抢占胶东半岛,推毁孔庙,康有为联合800余人上书朝廷,在全国掀起了“保国、保种、保教”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毁孔庙,成为百日维新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每年9月份举办的祭孔活动已成为曲阜当地“保留节目”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三千年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区”的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建设文化特区是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深刻的时代意义。

曲阜文化特区之“特”,意味着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开创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即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以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内在支撑,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配合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建设中国文化特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性关头,即如何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社会是否和谐?人与自然是否协调?江河是否被污染?食品是否安全?人是否活得幸福?社会是否公平正义?实现这一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文化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一个拥有仁义诚信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形态才具备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批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化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因此,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配合中国文化建设方针改变,在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奉行的方针是“破旧立新”。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是批评与否定的对象。目前,我国文化建设方针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六中全会又进而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如何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一个具有独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体性。“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张岱年先生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何谓“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等。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丧失,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为景仰的顾炎武尝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儒家一直将“国家”与“天下”两个范畴严格区分。历史上“国家”之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这一概念则不同。“天下”不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标识。“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正因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会四处奔波,高喊“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章太炎之吁喊,已有先儒“存亡继绝”、“续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则民族文化血脉存。因此,在具体落实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方针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课题。“现代国家”并非单纯指谓经济的现代化,更重要还在于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在稳健地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力量与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民族文化基础何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如何评判?前者关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产物,与中国文化绝缘;后者关系到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适性的正义思想传统。回溯两千多年儒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民主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之外,其文化史意义还表现为倡导人性平等。康有为评论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赋,因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学者进而抉发出孟子社会政治学说隐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钱穆由此点明孟子性善说中蕴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启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说彰显“自由意志”精神,黄俊杰认为此乃梁任公思孟学中“最具创发性之见解。”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断阐发的“民惟邦本”、“从道不从君”、“天下为公”、“居仁由义”、“民贵君轻”、“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体系中内蕴着深厚的正义性与公平性思想资源。这些正义、平等与公正思想,对于目前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而言,将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人不仅可由儒家“心性之学”成就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也可由“心性之学”成就民主“政治的主体”。李明辉指出,在这一宣言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人性恶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论——“即建立在性善说之基础上的民主理论。”

四、在人文地理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

其二,曲阜是黄帝故里;

其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所在地、

其四,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

邹城(孟子)、

苍山(荀子)、

微山湖(微子墓)、

嘉祥与平邑(曾子父子)、

章丘(伏生)、

滕州(叔孙通、儒家弟子墨子、北辛文化)、

济宁(何休)、

沂南(诸葛亮)、

临沂(颜之推、颜师古)、

泰安、宁阳(大汶口文化、孔子遗迹)、

济南章丘(龙山文化)、

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类型之一)、

泗水(尼丘山)。

五、在历史文化资源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据几次文物普查,曲阜现有各类文物古迹遗存560多处,其中孔庙、孔府及孔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保存有金、元、明、清历代古建筑1300余间,汉代以来碑刻、石刻5000余块,古代墓葬10余座,古树名木近2万棵,库藏文物10万余件,其中孔府档案26万件,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0多个。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是中国目前仅存的3000年左右的城墙遗址,其价值和地位不亚于孔庙。

1982年,曲阜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8年,国家旅游局把曲阜列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2005年,又将曲阜三孔和明故城列为首批5A级景区。

2008年,文化部批准曲阜文化产业园为国际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只有曲阜1家属于县级行政区域),最近,曲阜一批大文化遗址项目列入世界银行以及中国重点项目。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中国目前正在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现代国家”必要条件之一,如果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既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现代国家”形态的必有之路。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谁最早提出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十三经》的动议?

■陈福康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提出来的。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山东大学联合中华书局启动《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又看到在《四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一文中,徐俊先生这样说:“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二十四史》点校从1958年启动,次年第一种《史记》出版。那么,在此前后,是否有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的动议呢?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点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规划,《十三经》则以清人注疏著作为主……”

也就是说,徐俊先生提出了在1956年前后是否有过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的动议的重要问题,但他却没有回答。我想接着他的提问回答:在那前后提出这样的动议是有的,提议者仍然还是郑振铎先生。他正是在提出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同时提议的,而且,他还一直把《十三经》放在《二十四史》的前面。

1956年11月25日,郑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谈印书》的文章中,便提到:“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说了。”

这年年底,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个全国政协的内部刊物《政协会刊》,由郑振铎任主编。1957年1月28日,该刊创刊。2月8日,郑先生在给上海图书馆潘景郑的信中说:“正在考虑,如何进行比较切实有用的工作,例如重印整理过的《十三经》、《廿四史》之类。此时不做,此项工作便将无人能做了!薪尽火传,承先启后的事业,正待我辈从事之也。”接着,在4月25日出版的《政协会刊》第2期上,他便正式发表了他的“专文”《整理古书的提议》。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他指出:“有许多重要的古书,我们还没有动手去整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点。鼎有三只足;学术研究和创造、发明,也有三只足。一只足是现代科学,一只足是民族文化遗产,一只足是外国的古代文化遗产。缺少了任何一只足,这座鼎就会站立不住。学术研究、创作或发明是要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学术的累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国外的著作,靠翻译;民族文化遗产,靠整理。我们提倡民族文化遗产已有好几年了。但对于最重要的古代文化的宝库,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曾经加以整理了没有呢?”

郑先生指出:“像《十三经》,阮元刻本,本来可用。但新出现的‘石经’、单疏、古写本、古刻本等等,可资以校勘的,还有不少。如果把《十三经》再加以一番整理,一定会后来居上的。”郑先生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时,是包括他期待的“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在内的!

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我仍然想起了一联诗: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学术经典

我既没有狂笑,也没有大哭。最直接的生理反应是马上病倒。
发烧39°8,在床上躺了两整天才渐渐好转。

十年酿就,生命里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11月第一版

■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是2008年底出版的,至今已过去3年多了,但调查、编写期间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以及其中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却丝毫没有淡忘。

1997年9月4日,我向北京语言大学提交了“《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计划”。从那以后,我们持续不断地向有关部门提出开展“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研究的申请计划。至2001年11月,“《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计划”已经写了第8稿。2001年12月7日,“汉语方言地图集”终于获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01年12月12日,获批准为北京语言大学“十五”规划项目。研究工作自此正式全面启动。

整个调查过程共持续了4年时间。第一个点于2002年12月5日开始调查,最后一个点于2006年12月19日完成调查。调查地点共930个,遍及全国(包括港澳台)各地,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点。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均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包括单字、词汇、语法共计1005个条目。所有调查点一律赴当地进行调查,收集到100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

所有调查材料经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版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该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根据调查结果,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方言特征分布地图。

经过六年多的持续奋斗,2008年1月25日,《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写工作全部完成。此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和煎熬,2009年1月5日下午5点,商务印书馆的送货车终于开到了北语语言所的楼下。同事们纷纷下去搬书,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就像十月怀胎的婴儿,终于可以见到他的模样,听到他的哭声,可以触摸到他的肌肤了。

等到把牛皮纸的包装打开,大8开的页幅,绛红色的封面,烫金的书名,还有压印的古朴图案,一切如想象,但似乎又超出想象。打开书本,清晰的图例,高档的纸张,精致的装订,一切都让我们喜出望外。悬着将近一年的心,到这一刻终于放下来了。

面对铺排在桌子上的地图集,我似乎应该狂笑,或者大哭。但我既没有狂笑,也没有大哭。最直接的生理反应是马上病倒。发烧39°8,在床上躺了两整天才渐渐好转。

2009年1月12日,“《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新闻发布会”举行。尘埃落定,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对我而言,《汉语方言地图集》并非印在纸上,而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